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2

《诗经》

公木赵雨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诗经》概说/1

二、《诗经》的思想内容/21

(一)周族初兴的部族史诗和农事歌咏/21

(二)殷商贵族的祖先颂歌和祭祀诗章/45

(三)西周初年的政治变迁和礼俗风情/55

(四)周衰之世的社会苦难和信仰变革/69

(五)春秋时代的礼乐崩坏和愤懑情怀/82

三、《诗经》的语言和艺术/92

四、《诗经》的地位与影响/105

一、《诗经》概说

人类在未有文字以前，便有了初始意义上的文学：神话和诗。具体说来，中国诗歌的萌生就和远古时期中华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劳作所开辟的文化宇宙标志着人的诞生，它使得诗歌这一歌唱人生的艺术的出现成为可能。先民在人生的艰辛劳苦之中不自觉地歌唱咏叹，这种富有节奏韵律的歌咏又美化了先民的刚健不息的人生历程。正如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说：“诗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程的节奏决定的。”集体劳作首先创造了诗歌的形式因素：韵律和节奏。这样的诗，《淮南子·道应训》中称为“举重劝力之歌”。诗句的意义和内涵则是在此起彼伏的歌声唱和中渐渐衍生的。相传伏羲氏有《纲罟歌》、《驾辩曲》，葛天氏有《八阙歌》，神农氏有《丰年歌》、《扶持歌》，可能都是远古时期中华先民劳作生活的写真。据《吴越春秋》记载，上古时候的孝子，因不忍见父母的尸身被禽兽所食，就守护在一旁，用竹子作弹弓来驱赶禽兽。诗为《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这种两字一句的节奏形式无疑是和渔猎时代简单的劳动水平相适应的。而诗中透露的先民朴素的伦理情感又标明中国诗歌的内容因素也在逐渐萌发。此外，先民对神明的敬畏赞叹也成了诗歌的意义之源。据《礼记·郊特牲》，伊耆氏作《蜡辞》：

土返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那时的中华先民刚迈入农耕时代的门口，生产力水平较低，这篇巫祝祭祀之文便透出先民们在神祇面前对于天人和諧的丰收年景的强烈祈盼。

上古时的诗歌多已散佚，黄帝唐虞之世的诗歌传世的也极少，且多为断章残篇，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完备的诗集就是“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迄幽、厉之缺”（《史记》）的《诗经》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来单称《诗》，共收诗篇三百零五首。其中包括殷商贵族祭祀祖先的《商颂》五篇，另外还有几篇周族的劳动祭歌和祖先颂歌（如《生民》、《公刘》、《七月》、《载芣》、《良耜》等），可能是夏、商时代周族兴邠居豳刚刚告别氏族公社阶段的作品。而《国风》中也还会有为数极少的形成于西周之前的古歌。除此之外就是从西周建国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贵族领



《齐风·还》“并驱从两肩兮”诗意图

主阶级专政的早期封建社会的作品了。这时的中国古典诗歌已初步成熟，完全可以说，《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

三百篇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是歌诗或乐歌，原来都归周乐官司乐太师掌管。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雅颂的意义，古人曾有许多猜测，多牵强附会；经近代学人研究，判定这正是音乐的分类：风是带地方色彩的音乐，义如土风民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周人自称西周王畿地方为夏，所以《墨子·天志下》引诗“大雅”作“大夏”；颂是贵族们祭祀用的音乐，是舞曲，颂有容的意思，所以《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现将风雅颂依产生的时代和地域分述如下：

第一，颂：四十篇，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合称三颂。

周颂是西周王室的庙堂祭祀乐歌，主要产生在西周建国初期。《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既絀殷命，夷淮夷……兴正礼乐，而民和睦，颂声兴”。其时政治安定，经济兴旺，为巩固和发展这种兴盛局面，大兴礼乐，为此制作祭祀的乐歌。在整个“成康盛世”，这些乐歌已积累不少，昭王时又继续补充修订。从这些诗所祭祀的先王和所反映的史实来看，可以判定周颂大部分制作在公元前 1127 年以后。周颂中最早的诗，可能是成于早周社会的《载芣》、《良耜》，此外就是武王伐纣胜利回朝祭祀文王时制作的《大武舞歌》六篇了，在今本《诗经》中比较可信的是尚保存其中的《武》、《桓》、《赉》三篇；最晚的诗是昭王初年祭祀武、成、康三王的《执竞》。这些虽都很难确考，但我们仍可据以约略推断它的主体部分的产生时代基本不出西周初期一个世纪之间。周颂的制作，大都出自史官和太师（乐官）的手笔，地点当然是在镐京。这些诗篇记述先王的功业，歌颂功德，难免夸张揄扬；祭祀宗庙，祈福神明，又带有严肃古板和宗教玄秘的色彩。作为庙堂文学的“颂”，自然有庄严雄武之风，但在写作上偏于纪事铺陈，少抒情，无韵律，缺文采，文学艺术价值并不太高。重要的是

它们保存了周初分邦建国兴盛时期的阶级状况、政治史实、经济发展、典章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确凿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鲁颂比周颂晚几个世纪，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鲁是周的后裔封地，在今山东一带。成王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朱熹《诗集传》说：“武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这是关于鲁颂的来源。今存鲁颂四篇，一说史克作，一说奚斯作，是颂美鲁僖公的威仪的，作于公元前七世纪。

商颂是殷商贵族奴隶主的祖先颂歌。殷商的音乐和舞蹈都相当发达，这类颂歌在当时定然会是很很多的，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据《国语·鲁语》记载，闵马父于公元前 487 年曾说过：“昔，（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可知商颂是由殷商后裔宋贵族保留下来的，平王东迁前后还有十二篇，宋大夫正考父为了校勘它，还曾向周太师请教过，到《诗经》结集时只剩下五篇了。宋国都今河南商丘。朱熹《诗集传》说：“商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以此遂引起商颂是宋诗亦即周诗的歧说，甚至认为是正考父作以赞美宋襄公的。这种歧说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根据今文经学中的鲁诗说，在《史

记·宋世家》中写道：“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这说法至今仍为学术界一些人所遵从。不过商颂记述的是殷商烈祖功业，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商颂制作于殷商时代正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第二，雅：一百零五篇，包括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合称二雅。

除保存在大雅中的早期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外，其余全部是西周的作品。它们主要是朝会的乐歌，朱熹《诗集传》说：大雅是“朝会之乐”。应用于诸侯朝聘、贵族享宴等朝会典礼。这其中有歌颂先王功德的题材，有追怀传说中先祖和开国英雄的题材，有赞美廊庙功臣的题材。它对我们了解周初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早周历史，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这些诗大多产生于西周前半期和宣王“中兴”时期，一般出自史官太师的手笔，有的是公卿列士的献诗，可称“士大夫文学”。它在创作上不像周颂那样受到庙堂歌颂舞蹈形式的束缚，比较生动，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性。西周盛世并不长，七八十年就衰落了。穆、夷以后，政治腐败，社会危机，贪残昏暗的厉王更弄得民怨沸腾，外患严重，以致在民不堪命的暴动中被“国人”放逐。宣王号称“中兴”，实行开明政治，《云汉》、《崧高》，复闻颂声。可是由于外御戎狄，战事频繁，剥削加

重，又加深了社会危机，国势已蹶而难振。幽王又是一个暴虐的昏君，西周终于灭亡。《大雅》中有一部分讽刺诗，就产生在厉、幽两代。这些诗直陈时弊，批评王政和大臣，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反映了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怨恨，深具忧患意识，富悲壮沉郁的风格，是《大雅》中的重要篇章。

小雅基本上是西周后期的作品。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朝会和贵族享宴的乐歌。也有说小雅是专用于诸侯的。朱熹《诗集传》说：小雅是“晏飨之乐”，其实和大雅没有重大区别（小雅中还包括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小雅中的相当部分是宣王时代所制作。宣王“中兴”图治，修礼兴乐，公卿列士献诗，缅怀先王和记述宣王的文治武功，应用范围又从朝会扩延到贵族社会的各种典礼和宴会，这类诗反映着一定的历史面貌，包括贵族阶级的生活、习俗和伦理。其中也保存着少量农事诗，如《甫田》、《大田》可能成于早周时代，《信南山》据说作于幽王时代，都是研究周族农业经济的重要史料。西周后期社会危机深化，贵族阶级激烈分化，一部分士大夫写了一些讽刺诗和怨刺诗。这些讽谏和怨刺之作，占了小雅的大部分，它们都是针砭时政，揭露社会政治的不合理现象。厉、幽二世昏乱的现实，使贵族阶级的下层也经历着社会动荡的痛苦，陷于没落地位，迫使他们比较接近人民，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人民的困苦。小雅中的这一部分诗篇，大胆揭露，言词激切，感情深沉，抒写动人，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是全部《诗经》中亦称上乘的优秀作品。

第三，风：共一百六十篇，分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诗歌（但也有少量贵族创作的诗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在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包括当时中国的全部地域，主要在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这广阔的区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国风诗篇数量占《诗经》全部作品的大半，就总体来说，其中内容也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晶莹的珠宝。

国风产生的地域既广，产生的时代也经历久长。其中豳风七篇可能产生在西周初期，但亦未定；一小部分产生于东周，是春秋初期至中期的作品。西周末年，国内危机严重，戎族入侵，幽王被杀，公元前 770 年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东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处于更大的动荡和变革之中。历史上把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6 年称为春秋时代。《陈风·株林》是讽刺陈灵公君臣淫乱的诗，陈灵公被御叔之子征叔杀死于公元前 598 年，可以推断《株林》产生于这年后不久，这大概是《国

风》中可以考知的最晚的作品。

关于国风的时代和地域，历来发生争论最多的是《邶风》和《周南》、《召南》的问题。

邶风，邶国的风谣。邶的疆土在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周族祖先公刘从原来居住的陕西武功有台地方迁移到这里，披荆斩棘，“彻田为粮”；又“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周族才慢慢兴盛起来。因此，邶这个地方可以算做周族的发祥地。西周时代邶国封给什么人，无可考。西周亡后，此地归秦所有。今存邶风七首，至少是西周初期作品，约略产生于成王时代，有的诗篇如《七月》则是古代周族劳动祭歌的遗留。不过后人又有认为是西周后期的诗，甚至近人郭沫若析释《七月》，认为“确实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作品”。有的学人进一步推断邶风七篇全部是春秋后期的作品。还有人提出邶风是鲁风，“不是西周的诗，应是春秋时代的鲁诗”。诸说纷纭，但都无确凿材料。因此我们仍以为邶风最晚也当成于西周早期。《毛诗序》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其说虽未必全信，而作为诗的写作背景，也是合乎情理的。

周南、召南，号称二南，是两个地域的土乐，因何得名，说法不一。西汉今文三家以为是地名。鲁诗说：“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韩诗说召南“在南郡、南阳之间”。北宋苏辙于其《诗

集传》中首倡“二南独立”说，认为南应与风雅颂并列为四，即把“周南”、“召南”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单列一类。此说得到许多人赞同，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也说：“南者，诗之一体。”当代已故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的名称（就是箏字）。”我们以为这个“南”字可能是方位词。西周初期，周公姬旦长住东部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召公姬奭长住西部镐京，统治西方诸侯。由陕（今河南陕县）分界。周南，当是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域；召南，当是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域。二南中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它们都是南国地方的民歌。既然是南国地方的诗乐，当然就是南音了。但必须指出：其一，此“南”首先是方位词，其次才以地域之名指“南音”。其二，即使二南是南方土乐，它们仍是风诗的一种，“二南独立”说是不能成立的。

“周南”、“召南”作为地域名称，虽然可以上溯到西周初期；但二南中的诗篇却大部分和其它国风一样，基本上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而最晚不能迟于周僖王之世（前681—前677）。《左传》僖二十八年记：“汉阳之姬，楚尽实之。”经过楚伐随、伐申、伐蔡、伐邓等战争，江汉汝一带姬姓小国全都灭亡。所以二南诗的编采当在这些小

国灭亡前的春秋初期，二南中也有部分是西周后期流传下来的作品，至于是否能上推到西周建国之初，或者还有更早的诗，这就难以确考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诗经》中的作品基本上是周族的诗章。其中绝大部分诗篇都产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前六世纪西周建国至春秋中叶的领主制封建社会，少数产生在先周和殷商时期。它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空间范围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又兼有部分江汉流域的上风；作者多为平民农夫，但也有贵族领主和士大夫的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又包括宗教祭祀、政治演进、思想风习、农耕劳作、爱情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堪称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情长卷和百科全书。《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选集，莫立了自然朴厚、直抒胸臆的诗学传统；它在文学方面的成熟奇美的成就更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量。

如前所述，《诗经》一书是按风、雅、颂三大部分编排而成的。那么，它是怎样編集起来的呢？

国风和小雅中的部分诗篇，多是闾巷传诵的歌谣。关于这部分诗歌的结集，汉代班固曾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何休也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

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宣十五年《解诂》）这就是说周代曾有过由官员搜集诗谣以使下情上达的采诗制度。采诗官多为老年无子行走四方的男女“行人”。他们摇着以木为舌的大铃，沿着道路穿行于各宗族公社之间，四处搜讨公社农民讽诵的歌诗。掌管音乐的太师即《国语·周语》中所说“瞽献曲”一类的盲者，则对这些诗谣整理、合乐，再使人演唱给天子听。这种制度可能是上古氏族公社时代民主风俗的遗留，但也有着它不得不如此的直接原因。周代农民以宗族公社为单位聚族而居，每个宗族公社都有集中的住宅区（称“邑”），四周是田地和草场（称“郊”、“牧”、“野”），外面是边境林。古时交通不便，把各个宗族公社联结起来的道路只有一条，农民平时又不得越出公社的疆界，这样信息的流通和传播就缺乏管道来舒畅了。那时的公社农民春种、夏耘、秋收，农活十分繁重，只有到冬季休耕期终日群聚在“邑”中，才有些传诵诗谣的闲暇。青年男女农民则在冬春之际彼此轮唱，传递情感。采诗官在新的一年初春“群居者”即将出邑居野耕耘田亩之时，沿路搜集歌诗以供统治者决策时参考，以使信息的上“移”能够实现。《国风》中西周、东周之交的作品还很多，到春秋中叶以后，王室衰微、政事废弛、局势混乱，采诗制度不复存在，竟如《孟子》中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今天所见的

《诗经》三百篇基本上都是四言诗，虽所涉地域极广，彼此语言互异，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却基本一致，它的形式又大体上整齐有致，因此不可能未经过搜集整理的过程。

至于颂诗和雅诗的大部分，则多系出于贵族领主阶级各阶层的作品。关于它的来源，我们认为是西周时期曾实行献诗制度的结果。《国语·周语》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说明“献诗”制度也还是西周君主的中央决策系统的一部分。雅诗中那些歌颂和讽谏的诗篇大约就是公卿、列士所献。有的诗中还出现了作者的名字，如《大雅》中《崧高》和《烝民》两篇，都有“吉甫作诵”之句，这吉甫便是西周宣王时的著名贵族尹吉甫；《小雅》中《节南山》也著明“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这家父便是周幽王时的一位周大夫。有些典礼的颂诗或雅诗，如祭祖、宴客、出兵、田猎等场合所用的乐章，大约出自巫史等有关职官之手。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作品作年更早，属太师保存的旧乐章。此外还有些诗篇是统治阶级下层分子的作品，如《小雅·巷伯》的作者是“寺人孟子”，寺人便是阉人，即宫内侍御的小臣；国风、小雅中有少数诗篇是属于这类个人抒愤的性质，既非奉命制作，又非有意进献，它们到达太师手里的途径大约和歌谣差不多，是被采录的。采诗和献诗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政治的效果，以便进一步

巩固统治，即《汉书·艺文志》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时诗章的编集使用，除娱乐歌舞和教育子弟外，还有丰富的讽时谕志的功能。据《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亡到秦，秦穆公设宴招待。公子重耳即席赋《河水》诗，以喻自己投秦是河水朝宗于海。秦穆公赋《小雅·六月》，以喻公子重耳返晋时必能佐周兴国，开创大业。那种以赋《诗》为外交辞令的普遍风气是令人神往的，赋诗言志要求具备细腻的艺术感受和诗化的人生境界，它标明了周代已有较发达的文化水平和较成熟的礼的生活。

《诗经》的编定是复杂和艰巨的工程，它结集、整理和删汰肯定不是一人、一时、一地所能完成的。《诗经》最初是在周室的王宫内成篇、合册的，具体地说，周太师可能就是诗的总纂。最晚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诗经》就已有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其分类名目和先后次序同今本《诗经》大抵相似。而且孔子也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看到的是和现存《诗经》篇目大体相同的本子。但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周

室衰微，学术下移。在人们辗转传授、抄录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各种大同小异的《诗》抄本，它们或是辞曲错讹混乱，或是诗篇零落不全，这样的本子就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所说，已经“无与弦歌之用”了。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又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论”就是“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而“次”就是编排。这就是说，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时，于周游列国后回到了鲁国，开始了他的著述和古籍整理工作。孔子根据搜集到的各种《诗》抄本，删掉了各版本中彼此重复的诗篇，编排了《风》、《雅》、《颂》各章的次序，以《关雎》确定为《风》的首篇，《鹿鸣》、《文王》和《清庙》分别定为《小雅》、《大雅》和《颂》的首篇。他还精心修订曲谱，调整和丰富乐曲的音调，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一经过精心整理的《诗》，便是孔子用以教育弟子的课本。根据李长之先生的研究，《诗经》的编订排列大抵是遵循先今后古的时代次序的。编订者认为《颂》作年最早，所以放在最后；而《颂》之中又是《商颂》在后；《大雅》在《小雅》之后；《豳风》最古，所以放在《风》的最后。每卷中最短的诗又往往放在一卷之末，